

“中国因素”对“中国内地会 —海外基督使团”的影响

袁 瑒

【内容提要】 本文旨在对“中国内地会”在1950年撤离中国后的转型变迁和事工活动作一较全面的叙述和分析。该差会在“后中国时代”的事工活动反映了“中国因素”的效应,折射了其对海外华人社区和所在环境的适应,并因此而对全球性基督教差传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 中国内地会(CIM) 海外基督使团(OMF) “中国因素”
全球华人教会

“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缩写 CIM) 又译作“中华内地会”, 简称“内地会”, 是一个以中国为唯一传教工场的差传组织。1950年底, 该会决定撤离中国大陆, 转移到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并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缩写 OMF)。无论在中国禾场还是在国际差传界, CIM - OMF 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因此, 对 CIM - OMF 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与现状、差传策略、成员结构等各方面加以学术性研究, 对于了解西方传教运动、中国教会的属灵遗产以及老传教运动向新传教运动转型过程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首先简短回顾 CIM - OMF 对华人教会的正向影响, 再论述中国因素对 CIM - OMF 的反向影响, 然后再深入剖析 CIM - OMF 作为“中国因素”的载体, 如何进一步影响了全球基督教差传界。

一、CIM-OMF 对全球华人教会的影响

香港学者蔡锦图博士认为,CIM 体系下的传教士对中国教会领袖影响之深,不亚于“戴德生精神”对“内地会精神”的影响,因而研究 CIM 对追溯当代中国教会之神学传承、差传策略各方面之根源,皆具现实意义。^①可惜作者并未深入展开这一议题。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国际总主任林安国也认为,CIM-OMF“是影响华人教会最大的差会”。^②在中国时期,CIM 无疑是在华传教士人数最多、传教区覆盖面最广、传教历史悠久、信众人数庞大^③的西方差会。姚西伊博士认为,CIM 可以说是对中国教会性格塑造最关键的外来因素之一。^④虽然中国基督教两会的高层核心皆具自由派神学资历和宗派教会的成长背景,^⑤但 CIM 长达 80 多年对基层教会的经营,以及中国信众对戴德生及其“地方代表”的“集体记忆”,无形中提高了三自教会与私人聚会点基层信徒的内在同质性。即便是撤离中国长达一个甲子之后,很多海内外华人教会组织或领袖人物在历史传承上仍能捕捉到“内地会基因”。华人教会的低教派(low church)倾向、反智主义、对圣经权威的尊重、对基要主义信仰内涵的坚持,以及对祷告的重视,固属赴华差会中基要派阵营的共同属灵遗产,但是由平信徒传教士组成的 CIM 团体所展示的如上特征更为显性。另一方面,CIM 的跨宗派主义以及本土化策略,又在某种程度上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去宗派化”的“三自革新运动”和 1958 年的联合崇拜铺垫了群众基础。“后

CIM 时代”的中国教会所呈现的貌似矛盾的现象便是:CIM 遗留下来的教会多半成为三自体系的基层教会,而 CIM 与之合作过、甚至为之立传的中国教会领袖(如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杨绍唐等),则皆被视作三自体系以外的人物。这种对 CIM 的属灵传统的共同记忆不仅存在于中国境内的教会,也存在于海外的华人福音派教会。

在“后中国大陆时期”,CIM-OMF 开始与东南亚华人教会协力合作;开放成员制之后,CIM-OMF 拥有最早进入国际差传体系的华裔传教士团体;亚洲本部成立以来,CIM-OMF 又凝聚了东南亚的华裔教会领袖与精英。最能体现 CIM-OMF 对当地基督教组织影响的案例,莫过于台湾校园团契(CEF)与海外校园。当时的台湾地区已非差传处女地,本土教会的建立与管理由宗派差会提供支持,但独立于教会体系的基督教组织则尚无模板可效。以合作伙伴身份入台的跨宗派组织 CIM-OMF 提供了一种参考范本。CEF 的负责人在《薪火相传》一书中明言:CEF 提供了一种参考范本。CEF 的负责人在《薪火相传》一书中明言:校园团契的事奉哲学来自两个重要的渊源:一方面为 CIM“舍己精神及信心之路”,另一方面则“溯于英国大学团契(IVF)的正统福音派神学路线”。^⑥CEF 的组织章程带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 CIM-OMF 印记:一、CEF 是无宗派的独立组织,不隶属于任何具体教会;二、夫妻双方必须同时被 CEF 接纳,如果单身同工未来的配偶无法达至 CEF 同工的要求,则需辞职;三、采用典型的信心差会“两不两无”之财政共享体系(pool system):不募捐、不举债、无津贴保障、无区别待遇。在传统思想和保守势力仍十分强大的五、六十年代,这种强调男女平权的“共产主义”组织模式可谓十分激进。CEF 成立至今 50 多年,仍保持着这些运作原则。^⑦

除了华人差会和福音组织外,CIM-OMF 的“信心原则”对华人神学培训机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CIM 在中国时期的合作伙伴,无论是中华神学院,还是重庆神学院,虽然在财政运作方面皆与 CIM 无涉,但两者却都以 CIM 带到中国的“仰望神的供应”、“不募捐”、“不借贷”的信

① 蔡锦图:《中国内地会宣教理念在中国的实践》,载于《山道期刊——宣教神学与实践》,2006 年第 9 卷第 2 期(总第 18 期),第 89 页。但作者未明确界定“中国教会”的范畴。

② 林安国:《华人教会宣教现状与突破》,载于《举目》2007 年 3 月,总第 25 期。

③ 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大教会团体为英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和伦敦会等合并而成的中华基督教会,信众人数为 166660 人,CIM 的信众人数为 89665 人。

④ 其他因素如:本土奋兴型传道人或布道团的全国性巡回布道(笔者对姚博士的访谈,2011 年 1 月 4 日,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⑤ 徐以骅:《纽约协和神学院与中国基督教会》,参见徐以骅:《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史论》,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 年。

⑥ 饶孝楫:《基础训练及在职训练》,参见黄从真、朱惠慈、张莲娣编:《薪火相传——校园团契四十年(1957-1997)》,台北:校园书房,1997 年,第 143 页。

⑦ 黄玉燕 2011 年 4 月 28 日与笔者的邮件。

心原则来处理资金问题。曾在证道出版社服务的曾霖芳于1966年创办海外神学院,亦以信心原则为财务原则。同样的财务政策,在CIM鼎盛时期的合作培训机构的纲领中也屡见不鲜。可以说,信心原则已成为中国基层教会和福音机构的通用话语体系和行为准则,CIM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理念和师资,而非金钱。

二、中国对 CIM-OMF 的影响

笔者认为,一方面,CIM影响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也造就了CIM。几乎每一项CIM的传教原则都与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国情有关:人口散居乡间、通商口岸外侨社团良莠不齐,促使戴德生打破普通传教差会的“通商口岸路线”而采取“内地路线”;中国人口之众所带来的迫切性,促使戴德生起用平信徒和女性等宣教储军,并从各个宗派招募人马;中国疆域之广,则使得“按地理划分的宗派主义”成为可能;由于鸦片贸易和列强入侵等原因引发的中国民间的排外抵触情绪,促使CIM传教士在衣食住行等生活层面认同中国风俗、行事低调,以减轻当地人的惊疑,而同时中国内地的贫穷落后,则要求传教士放弃维多利亚时代相对优越舒适的生活方式,安贫乐道;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地理距离和通讯距离,促使戴德生得以确立总部建在禾场的惊人决策;中国社会的男女授受不亲,更是无意中提高了赴华女性传教士的策略性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庞大、疆域宽广、亚文化多元,正是促使CIM成为信心差会之鼻祖以及全球最大传教组织之一的推动力。就国际关系而言,美国传教士往往成为中国问题的专家;在差传界,CIM成为中国禾场备受关注的发言人。没有中国,便没有中国内地会。中国是整个CIM的“稳定器”(stabilizer),CIM可以对应中国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但一旦失去中国,CIM似乎只有以不变来应对这一巨变。就这一意义上而言,失去中国的CIM-OMF即失去了改革创新的精神。在出中国、入亚洲之际,CIM对内为了保持凝聚力与认同感,对外为了维系85年建立起来的品牌与声誉,确实采取了“保持原状的姿态”(no change outlook),并在1952年1月《亿万华民》会刊中向支持本机构的读者强调,“差会仍

只是禾场暂变”,CIM-OMF仍是“同一个差会、同一队人马、同一套理念、同一份信息”。^⑧不知当时的决策者是否预见到“中国基因”将持续影响该机构数十年之久。

CIM-OMF“出中国、入亚洲”这一转型,不仅是外在和地理层面的,也是内在和精神层面的。波茅斯会议上所拟定的冗长拗口且自相矛盾的新机构名——“中国内地会之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恰如其分地传达了这种“连字衔接的身份”(hyphenated identity)^⑨:既不能忘怀于寄居85年之久的中国大陆,又不得不在亚洲各国各地重新布阵。而以非正式的“团契”(Fellowship)^⑩取代常用的正规语词如“差会”(Mission或Society),也折射出一种不确定心理。不仅如此,在1952-1965年的过渡期间,CIM-OMF的名称并未在全球通用:欧美差派国继续沿用旧称“中国内地会”,以此维持支持度和招募力;亚洲新工场开始使用新名“海外基督使团”,以此避免“中国”字样在冷战时期的亚洲可能会引起的敏感度。直到撤出中国近15年后,国际局势显明无望重返中国大陆,CIM-OMF才将“中国内地”的语词从机构名中正式删去,并在英语世界各本部启用OMF的新名。即便是OMF现在的公关出版物中,也通常会在括号里注明今世的OMF来自CIM的前身。笔者认为,从“连字符衔接的身份”过渡到“括号备注的身份”(bracketed identity),CIM-OMF始终无法割断其对“中国原配”的旧情。

在个人层面,老中国通们的“中国情结”不仅影响着他们个人的下半生,也影响着子女和周遭的亲友和社团。一部分人抱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遗憾“卸甲归田”,另一部分人虽然响应差会的决策转移到亚洲,却仍沉湎在中国的人文环境中。通常而言,在华时间越长的传教士,

⑧ Report of the Bournemouth Conference, issued with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Jan 1952).

⑨ 原为身份认同理论的名词,特指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孕育成的双重身份。

⑩ Fellowship一词本意为“团契”,“使团”则是Mission的对应词。团契通常指小型团体,很多大教会下分为不同的小型团契,团契也可以发展为教会,或在正规教会之外成立跨教会的团契。

越难以适应新的传教环境,年龄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与中国的认同感则是更深层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由资深传教士(几乎都是“老中国通”)组成的领袖层拘泥于在中国建立起来的经验,不愿轻易放弃适用于中国但不适用于亚洲的标准与先例。唯一的例外为1953年赴任的主任孙德生。本身为老中国通的孙氏传记作者罗柏士(Ron Roberts)一针见血地指出,孙氏之“无中国经验”正是CIM得以成功过渡到OMF的关键因素。^⑩

中国的影响力既是遗赠,也是包袱。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方式方法虽有一定的普世性,但并非对所有的亚洲传教区皆合体合身。可以说,CIM-OMF不仅以宣教动员的方式将“内地会版的中国”带给了西方基督教王国,也以福音布道的方式带给了亚洲。如前几章所述,一方面,中国经验给CIM-OMF带来了近百年的优良声誉、亲民的基层植堂路线、认同当地文化、规避政治势力、生活简朴以及长期委身等传统“资产”。另一方面,基于中国经验的策略也给CIM-OMF留下了内地定向、内部决策制、无视地区差异的财政共享制度、禁止资助本土传道人的本土化政策、本部对不场的二元化思维等沉重的“负资产”。可以说,CIM-OMF入亚洲时期的“再度本土化”所需经历的阵痛绝不亚于其最初入华时的“首度本土化”。“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时,往往比新手上路更令人束手无策。

表1显示了CIM-OMF入亚洲之后数十年间“老中国通”在其团队中的比重,以五年为间隔期。CIM-OMF入亚洲之初(1955年),其团队中近四分之三的传教士为“前中国成员”;从中国撤离近10年后,这一比例仍接近整个团队的半数;在CIM-OMF正式更名为OMF并宣布向非欧裔开放成员制时(1965年),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拥有中国经历。若以1950年CIM团体总数710人的基数推算,1955年参与亚洲事工的394人约占原团队的半数(55.5%)。1950-1970年这20年间,每5年减少约三分之一“老中国通”,1975年以后,这一团体迫近退休年龄,其

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下降的速度大幅提速,1970-1985年的15年间,每年减少约半数,而1985-1990年这5年则减少了四分之三。直到1992年,“老中国通”才完全从现任成员名录中消失。

表1 1950-1990年间CIM-OMF老中国通在整个团队中所占比例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老中国通	710	394	365	315	218	127	60	29	8
总体正式成员数	710	528	750	862	849	870	870	917	942
百分比	100%	74.6%	49%	36.5%	25.7%	14.5%	6.9%	3.2%	0.8%

资料来源:历年的Prayer Directory。

*1976年以后的名录中有3名成员的入会日期在1949年之前,但不在CIM 1950年的名录上,当为BEM合并进来的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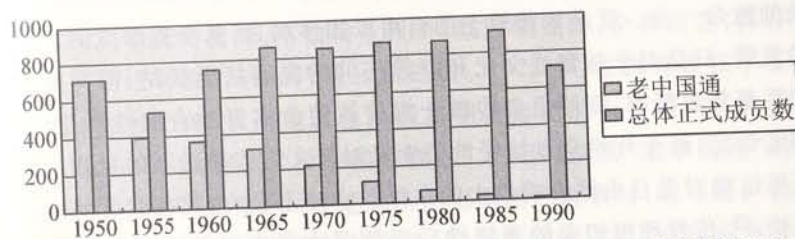


图1 1950-1990年间CIM-OMF老中国通人数与整个团队人数的对比

基于CIM-OMF按年资晋升的传统,“老中国通”在领袖层中的比例更为惊人。按统计,1965年——即CIM-OMF成立100周年、离开中国近15年之际——11名主任级领袖全数为“老中国通”,最早加入CIM-OMF的【澳】贝德立(R. J. R. Butler)“工龄”长达37年。同年,CIM最高决策体制海外咨委会的23名成员中有20人为“老中国通”,比例高达87%,剩余3人中1人为在中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传教士(即David Hayman),另2人则以代理身份咨议,并非正职(即Denis J. V. Lane和Arthur F. Pennington)。当时美国咨委会的15名主要成员、澳洲咨委会的5名主要成员、新西兰咨委会的2名主要成员全数为“老中国通”,英国咨委会11名成员中亦含9

^⑩ Ron Roberts & Gwen Roberts, *To Fight Better: A Biography of J. Oswald Sanders* (Highland: OMF, 1989), p. 122.

名“老中国通”(82%)。而同年“老中国通”在 CIM-OMF 整个团队中的比例仅为 36.5%。5 年后(1970 年),CIM-OMF 的 24 名领袖中仍有 18 名为“老中国通”(62.5%),若将在中国出生长大的 2 名第二代传教士(即 Hayman 和 Alan Knight)算在其内,比例将升至 70.8%。同年,“老中国通”在 CIM-OMF 整个团队中的比例已降至 25.7%。

笔者认为中国对 CIM-OMF 最重要的一大影响力为“撤退驱动力”。当大部分亚非拉地区尚未独立的时候,卫理公会前中国传教士安素会督(Bishop Ralph A. Ward)便从中国的变化中预见到,民族主义及社会革命已席卷亚洲、东南太平洋群岛以及非洲大地,“中国关门”的经验或为亚非拉各传教区整体关门之前的大热身。^⑫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重创,但是西方在亚洲的殖民体系仍未即时瓦解,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成功吹响了亚非拉后殖民运动前奏之际,西方差会既不具备从前殖民地国家大批撤离的经验,亦不具备永不返回的心理准备。姚西伊博士认为,“中国溃逃”(China Debacle)乃老传教运动的致命一击。就赴华传教士的自由派团体而言,从李提摩太到赛珍珠的发展,只是对非基督教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宽容甚至接纳;而共产主义战胜基督教精神,则使很多传教士对传教使命本身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彻底否定,甚至开始全盘接受世俗学者对跨文化传教运动的批判。这次反思运动对受自由派影响最大的宗派教会冲击最大,其在战后的衰落也最快。^⑬传教理想幻灭的逻辑性后果便是大量宗派教会对传教事业的逐步放弃。以差派大国美国为例,一战时,自由派传教士在万余名美籍海外传教士团体中占到八成;到了 1996 年,43600 名美籍海外新教传教士中只有 2600 名来自自由派教会。^⑭

然而,“中国关门”对 CIM-OMF 反而起到了“凤凰涅槃”的效果。

⑫ Ralph A. Ward, "Do Institutions Ruin Missions?," *The Christian Century* LXVIII:46 (Nov. 14, 1951), p. 1305.

⑬ 笔者 2011 年 1 月 4 日对姚博士的访谈,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

⑭ Allen D. Hertzke, "Evangelicals and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in Michael Cromartie, ed., *A Public Faith, Evangelicals and Civic Engagemen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 218.

CIM-OMF 前 100 年的历史正是经历了“使命难达”(mission impossible)到“大功告成”(mission completed)再到“使命再生”(mission regenerated)的过程。痛定思痛之后的 CIM-OMF,除了重申“本土化政策”的重要性外,更是从进入传教区第一天便为“安乐死”、甚至“夭亡”和“暴卒”式的结局而积极预备。亚洲时期的 OMF“在各国寄居为客”的心态取代了中国时期的 CIM“在一国永久居留”的心态。

历史证明,从中国转往亚洲之后,亚洲各地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他差会也在世界各地遭遇类似经历,苏伊士运河危机和刚果独立运动期间,大批驻非差会的传教士也被驱逐。“不情愿的撤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不断上演,“中国经验”显然为 CIM-OMF 提供了可资比对的前车之鉴。五、六十年代,CIM-OMF 尝试进入印支三国,至 70 年代后期,在共产主义节节胜利的大国际背景下,西方传教组织在中南半岛只剩下泰国一个传教区。CIM-OMF 在中国学到的最后一个教训便是“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进入传教区时只做人力投资,不做物业投资,政府驱逐时,全身而退,保存实力。笔者谓之游击战术式巡回布道法。1975 年,在洪森政权下工作了短短一年的 OMF 成员在红色高棉占领首都之前仓皇撤离。高明道(Don Cormack)本人虽非“前中国传教士”,但显然从其“老中国通”的岳父身上感染了“中国情结”,在谈及从金边撤离之情景时,他写道:“接走我们的是一架款式古老的螺旋桨军机,同一型号的飞机,30 年前在中国也执行过同样的任务。”^⑮而前文所述及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十年大限”的签证紧缩,则可被视作“中国关门”的“慢镜头”。

进入 21 世纪,极少数曾经驱逐过外籍传教士的国家开始重新签发传教士签证,但大部分则演变为所谓的“创启地区”。CIM-OMF 在中国后期所发轫、至亚洲初期日臻成熟的那种分散型与隐藏型的影响力路线,也使其更易适应创启型传教区。据该机构某位负责人的观点,即便是在没有技术性因素阻碍 OMF 以宗教性 NGO 或其他的名义进入的地

⑮ 高明道(Don Cormack):《杀戮中的再生——柬埔寨教会剪影》,郑林生译,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4 年,第 121 页。

区,OMF 仍然倾向于采用以“散客”的形式进入不同社群的“弥散型”道路,而非在各大首府建立以办事处为事工核心的“聚合型”进路。^⑩这与在华期间 CIM—反宗派差会在通商口岸建立“差传大院”(mission compound)的被动模式、采用两两成对深入内地的主动模式如出一辙。如图 2 和图 3 所显示,以 OMF 在某地区所驻成员 10 名计,如果聚集一处,便只能接触一时一地的人群;如果分散各地,则可以接触不同的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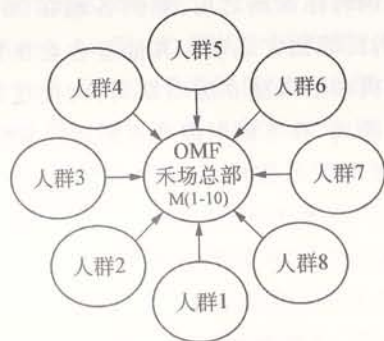


图2 聚合型传教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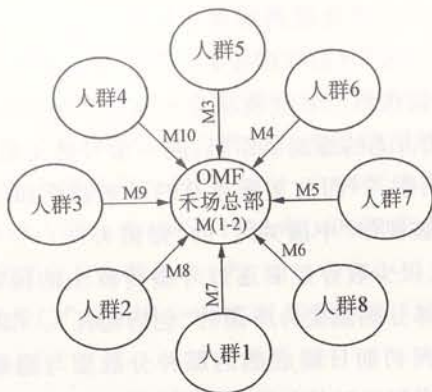


图3 弥散型传教模式

M = 传教士 (missionary)

三、CIM—OMF 影响力的全球地域化

以主权国家为研究单位的国际政治学传统现实主义往往难以覆盖国际传教运动的跨国网络。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大卫·辛格(David Singer)等人认为,分析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种角度进行,传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人是被国家所占有的,所以他与其他不同国家中的人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非连续的。然而这种等级型的分析模式,对国际传教运动网络型的影响往往是缺乏解释力的。台湾学者石之瑜和权湘在《女性主义的政治批判:谁的知识?谁的国家?》中对传统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批判,并将之归因为男性思维的局限性,其中第三点便特别提出“等级关系”与“蛛网关系”两种研究模式的差异:主流国际关系学者依据国家权力的大小将国际体系中的两极体系划分为超级大国和中小国家等,并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外在行为根据它在这个权力等级中的位置来决定。等级关系被先验给定地视作公共政治领域的主导力,因此便有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个人关系的建构,这样生硬的等级观念并不是实际生活中网络式的互动关系。事实上,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皆会呈现出蛛网般的复杂交错,并非完全由权力划分出来的等级关系所决定。^⑪

笔者认同石、权两位学者的观点,并认为女性主义的网络理论更适合分析像 CIM—OMF 这样由多元本部和多元禾场构建成的国际公民社会性组织。“中国因素”正是通过 CIM—OMF 的国际化载体被带到世界各地。总体而言,学界对 CIM—OMF 影响力的理解往往是假定的,而非实证的;是诗意的,而非学术的;是大而化之的,而非言之有据的。依笔者所见,迄今为止对该组织影响力的专论只有丹尼尔·培根(Daniel W. Bacon)所著《本于信以至于信:戴德生对信心差会运动的影响》(From Faith to Faith: The Influence of Hudson Taylor on the Faith Missions

^⑩ 笔者 2011 年 1 月 4 日对 OMF 某负责人(姓名隐去)的访谈,香港 OMF 办公室。

^⑪ 石之瑜、权湘:《女性主义的政治批判:谁的知识?谁的国家?》,台北:正中书局,1994 年,第 64—65 页。

Movement)^⑧之论文,但正如其副标题所概括的,该研究仅集中于戴德生本人对信心差会运动的影响,内容也侧重 CIM-OMF 中国时期的成就。加上培根本人为 OMF 赴日传教士,后出任 OMF 美国本部主任,因此难免有“自吹自擂”之嫌。

“影响力”乃是一个可操作性较弱、极其难以量化的研究对象。如前几章所述,CIM-OMF 出中国后,除了在泰、日两国建立过独立的差会体系,在其他传教区则采用了借调(如台湾、印尼)、神学教育(如新、马)和宣教动员(如韩国)等新进路,本土化策略的贯彻和启发性禾场的出现,也使传统的“影响力指数”(如传教士人数、预算、堂会数、受洗人数、领圣餐人数等)日益不适用。因此笔者尝试用三种视觉图演示 CIM-OMF 的全球影响力。在国际层面,OMF 的总主任通过参加各种国际差传会议,对全球基督教差传事业产生影响。戴德生被邀请参与发言的地区级和世界级差传会议包括:1877 年和 1890 年在上海召开的两届在华传教大会(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y in China)、1888 年在伦敦举行的海外差传百年大会(Centenary Conference on Foreign Missions)和在美加边界举行的尼加拉瓜圣经大会(Niagara Bible Conference)、1900 年在纽约举行的普世差传会议(Ecumenical Missionary Conference)。^⑨戴德生的各位继任同样被频繁邀请为同时代世界级差传大会的讲员。譬如,现任总主任冯浩鑒在近三年中,便曾出任过尔班拿大会(Urbana Convention, 2009)、第三届洛桑会议(Lausanne Congress, 2010)、凯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 2011)以及第八届华福大会(CCCOW, 2011)的讲员。国际总部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差传研究主任)也在其相关专业中与同行保持对话。自华福兰会督(Frank Houghton)之后,CIM-OMF 总主任的任期以 60 岁为上限,这一新规定反而使得历届 OMF 全球最高领导人在去任之后仍得以继续发挥影响力,甚至在某种

⑧ 主标题典出《罗马书》1:17,英王钦定本(KJV)为“from faith to faith”,新国际译本为“by faith from first to last”。

⑨ Daniel W. Bacon, *From Faith to Faith: The Influence of Hudson Taylor on the Faith Missions Movement* (Illinois: OMF, 1982), pp. 120-127.

意义上成为 OMF 在世界各地的“无任所大使”。譬如,1991 年,OMF 邀请其前任总主任孙德生(J. O. Sanders)在澳洲各地巡回布道,40 多天(7月17日至8月26日)不间断地在各宗派教会和基督教机构举办茶话会、查经聚会、教牧人员午餐会、主日敬拜聚会,聚会强度达一天之内两到三场。8月底之后,布道频率逐渐降低,但 OMF 的行程安排则一直持续到12月初。不仅如此,孙德生在澳洲之行之前,已经在加拿大、英格兰、苏格兰和新加坡等地进行了类似的巡回布道。^⑩

在差派国层面,CIM-OMF 的关系网可以从高层和基层两方面来看。在高层方面,OMF 本部主任作为一个国际差会的地区代表,在该国的福音派差传界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其跨宗派的成员结构,远较一般宗派差会更能横向穿透不同宗派间的隔膜。OMF 各本部通常为该国福音派差传联会的重要成员组织,这些联会的领袖层中也不乏 OMF 成员或前成员。北美 CIM-OMF 为“跨宗派海外差传联会”(Interdenominational Foreign Missions Association,缩写 IFMA)的主要奠基者之一,CIM 北美主任亨利·弗罗斯特(Henry Frost)不仅为 1917 年 3 月 IFMA 筹备会议四大差会之一,并率先提出按 CIM 内部年会的范例举行跨差会年会的建议,并成为同年 9 月组织会议的主席,并全票通过被举为 IFMA 的第一任会长,任期达 10 年之久。^⑪英国本部所加入的乃是 50 年代末成立的“福音派差传联盟”(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60 年代末,以墨尔本为基地的 OMF 澳洲本部首先呼吁在维省成立福音派的差传联盟,并相继在澳洲各地成立类似的机构。^⑫新西兰本部先后成

⑩ “Learn to Live a Deeper Life with J. O. Sanders”, Handbill,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MST), Archive Box; “J. O. Sander Itinerary and Who Accompanies Him July 17-Aug 26 1991”, Document, MST Archive Box.

⑪ Edwin L. Frizen, Jr., *75 Years of IFMA 1917-1992: The Non-denominational Missions Movement*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pp. 103-117, 132.

⑫ Huntley 1971 年对 OMF 澳洲本部主任 Howard Knight 的访谈,转引自 David Huntley, *The Withdrawal of the CIM from China and the redeployment to New Fields in East Asia: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logy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Ph. D. Diss., Trinity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burgh, Indiana, 2002), p. 33.

为“终极世界”(Destination World)^②和浸信会体系的“差传世界”(Mission World)^③两大差传联会的主要成员。再以香港差传事工联会(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s)为例,其第38届董事会的现任文书即为OMF香港执行主任杜其彪牧师,而OMF香港咨委会前主席卢家驹则为其顾问。^④

CIM-OMF各本部主任在任和去任期间,往往兼任其他宗教职务,客观上也扩散了CIM-OMF的影响力。以北美本部主任、“老中国通”葛伟骏(Arthur Frederick Glasser, 1914-2009)为例,葛氏出任北美CIM-OMF负责人凡16年(1955-1970),任期先后曾在哥伦比亚圣经学院(Columbia Bible College)、圣约学院及神学院(Covenan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执教,并被授予富勒神学院跨文化研究学院名誉系主任(Dean Emeritus of the Schoo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葛氏也是美国差传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Missiology)的创办人暨编辑之一,曾任该会1982/1983届的主席,热衷于针对犹太人的传教事工,参与兹威买伊斯兰研究机构(Zweimer Institute for Islamic studies)的创建,并编辑撰写了多部差传学著述。^⑤

出于招募方面的供求性考量,CIM-OMF与各地的福音派神学培训机构皆保持密切关系,甚至在差传动员过程中催化了一系列以培训传教士为本旨的神学机构。在英国,早年有东伦敦宣教士培训学校(East London Training Institute)、如今有万族基督教学院(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芝加哥的慕迪神学院、多伦多的丁道尔神学院(Tyndale Seminary)以及澳洲的墨尔本圣经学院(Melbourne Bible

College)、^⑥新西兰圣经培训所(New Zealand Bible Training Institute)、^⑦新加坡的亚洲宣教士训练学院(Asian Cross-Cultural Training Institute)皆为此例。

CIM-OMF虽然与具普世派倾向的宗派教会存在神学分歧,但仍然在对方的圈子中拥有不少朋友甚至“裙带关系”。譬如,CIM首届北美主任、基要派立场鲜明的亨利·弗罗斯特之妻阿比·埃林伍德(Abbie Ellinwood),便是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干事弗兰克·埃林伍德(Dr. Frank Ellinwood)的侄女以及美部会(ABCFM)干事埃德蒙·K. 奥尔登(Dr. Edmund K. Alden)的表亲。^⑧因此,CIM-OMF虽然缺乏宗派教会既有的正式体系,仍能通过非正式的人脉私谊在具有潜在支持团体的地区打开局面、建立网络。1953年,英籍“老中国通”梅证光(Alexander Mair)通过个人圈子在苏格兰的高地和离岛建立联络点,最终被苏格兰国教会(Church of Scotland)和自由教会(the Free Church)两大对立团体同时接纳。^⑨中国时期,CIM在北欧和欧陆各国建立了一系列的伙伴差会,虽然这一“松散型联合体”在出中国的危机应对过程中解散,但CIM-OMF日后数十年间在这一“传统友谊”基础上在瑞士(1950)、德国(1967)和荷兰(1967)成立了新本部,原伙伴差会之一圣克里斯彻拿(St. Chrischona)差会于1953年合并加入CIM-OMF的瑞士本部便为一例。^⑩伙伴差会的旧谊也为在北欧语系的教会(如芬兰)中拓展“新地平线”(New Horizon)事工建立了历史基础。^⑪

在基层方面,CIM-OMF则通过建立祷告圈来触及草根信徒。北美首任主任亨利·福斯特(Henry Frost)视推动祷告联盟(Prayer Union)为

^② 后更名为 Bible College of Victoria, 今为 Melbourne School of Theology.

^③ 后更名为 Bible College of New Zealand, 今为 Laidlaw College.

^④ Dr. & Mrs. Howard Taylor, "By Faith . . .," *Henry W. Frost and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Philadelphia: CIM, 1938), p. 30.

^⑤ Rev. Alexander Mair, "Itinerating in the Highlands and Islands of Scotland," *Overseas Bulletin* (July 1958), p. 93.

^⑥ E. Baumann, "C. I. M. - O. M. F. in Switzerland," *Overseas Bulletin*, vol. XIX, no. 3 (May 1957), p. 58.

^⑦ Daily Prayer News, UK OMF, 11th Mar 2011.

^⑧ “终极世界”由 OMF、SIM、Pioneer、Tranzsend、WEC、Interserve 等机构组成。

^⑨ 据 OMF 新西兰总主任 Christine Harding 估计,OMF 体系中约一半新西兰籍成员来自浸信会。笔者 2011 年 10 月 11 日对哈丁的访谈,OMF 奥克兰办公室。

^⑩ http://www.hkacm.org.hk/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20&Pid=2&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2012 年 1 月 6 日。

^⑪ <http://www.wheaton.edu/bgc/archives/GUIDES/421.htm>, 2012 年 1 月 14 日。

要务,逐渐发展到超过 2000 名参与者。^③ 1956-1958 年之际,CIM-OMF 英国本部拥有 300 多个祷告圈、加拿大境内有 37 个、澳洲本部有 110 个、新西兰有 55 个祷告圈、34 名地方代表;^④ 1979 年前后,美国约有 250 多个 OMF 祷告会网络。^⑤ 组织祷告小组往往是组织联合祷告会和差传年会的热身,在某些基督教王国的边缘地带,CIM-OMF 往往是一个在宗派教会体系之外召开差传年会的机构,常年运作的细胞型祷告小组为这些全国性或全州性年会提供了网络建设和群众基础。

各本部咨委会(National/Home Council)乃是 OMF 在各差派国另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渠道。与 OMF 体系内的禾场咨委会(Field Council)国际咨委会(International Council)及国际执行咨委会(International Executive Council)不同,本部咨委会乃是由当地基督教会领袖或精英组成的义务顾问团,定期就甄选候选人、教会动向等方面向 OMF 提供建议。CIM-OMF 和本部咨委会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CIM-OMF 从咨委会吸纳建议,另一方面,CIM-OMF 的价值观和运作理念也通过咨委会辐射到各委员所隶属的教会和机构。而且,CIM-OMF 咨委会的成员往往同时担任其他传教组织、神学培训机构或超教会组织的董事、顾问或主席之职。^⑥

③ Edwin L. Frizen, Jr., *75 Years of IFMA 1917-1992: The Non-denominational Missions Movement*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p. 131.

④ J. H. M. Robinson,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New Zealand," *Overseas Bulletin*, vol. XIX, no. 4 (July 1957), p. 85; W. J. Michel, "CIM OMF in Australia," *Overseas Bulletin*, vol. XIX, no. 5 (Sep. 1957), p. 112; W. W. Tyler,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Canada," *Overseas Bulletin*, vol. XIX, no. 6 (Nov. 1957), p. 143.

⑤ 狄立礼(Larry Dinkins):《初到贵境——宣教事奉的心路历程》(*Help! My Halo's Slipping*),乐恩年译,OMF(1992),第 30 页。

⑥ 譬如,澳洲著名圣公会领袖之一 C. H. Nash (1866-1958),出任 CIM 咨委会成员凡 27 年(1916-1943),先后担任过 City Men's Bible Class 的圣经教师(1925-),CMS 的咨委会成员(1927-),协助 CMS 成立 League of Youth、圣雅各老教堂的助理牧师(1927-1941)、Campaigners for Christ 的奠基人(1936),同时也是 Bible Union of Australia 的成员,并曾出任其首届主席、各大培灵会议的讲员。参见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0, 665f; <http://adb.anu.edu.au/biography/nash-clifford-harris-7726>, 2012 年 1 月 12 日; D. Paproth, *Failure is not Final: A Life of C. H. Nash* (Sydney: CSAC, 1997).

在传教区层面,OMF 更是建立了一种复杂交错的网络。一方面 OMF 以外国差会身份加入当地的福音派传教组织联会。譬如:台湾 OMF 加入了“台湾省基督教传教士协会”(Taiwan Missionary Fellowship)、日本 OMF 加入了“日本福音派差会联会”(Japan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泰国 OMF 加入了“泰国福音派协会”(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Thailand)、柬埔寨 OMF 加入了“柬埔寨福音联会”(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mbodia)、蒙古 OMF 加入了“基督徒联合服务团”(Joint Christian Service)。另一方面,OMF 所植建的堂会往往成立或加入一个联会,如日本的“北海道福音派教会联会”和“日本福音教会联会”(Japan Evangelical Church Association),泰国的“泰国联合教会”(Associated Church of Thailand)、菲律宾的“菲律宾圣经教会联会”(Association of Bible Churches of the Philippines)。而在只能通过借调人力资源的方式进入的传教区,OMF 的价值观和差传理念也随之扩展到其他基督教机构和体系中,譬如其在印尼的担保组织“印尼基督教协会”(Indonesian Council of Churches)。这些教会联会及其成员组织虽然都是独立的当地机构,但往往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 OMF 合作,在“本土化”的方针指引下,OMF 也甘愿出任当地领袖的副职甚至下手。

从“三自理念”的角度而言,一个外来差会在传教士接收国越不具有影响力越是成功,CIM-OMF 的本土化政策执行得越彻底,势必越是名不经传。在“中国时期”,CIM 建立的教会往往会冠以“中华内地会”的前缀,CIM 虽非宗派型差会,也未形成全国性的联会,却因其堂会个数和信徒人数的众多,无形中成为一个“准宗派”。入亚洲之后,CIM-OMF 的本土化政策比中国时期更迈进一步,不仅在印尼和台湾未建立自己的体系,即便在日、泰、菲等建立联会的传教区,也避免在当地教会的联会名称中植入差会名称。因此,尽管 OMF 可能是当地最大的植堂型差会之一,若以 OMF 的关键词搜索各国和地区的教会名录,往往会一无所获。^⑦ 可以

⑦ 如 David B. Barrett 的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urches and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AD 1900-2000*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82) 一书中,只有泰国和菲律宾两章在表格部分提到 OMF(第 566 和 666 页)。

说, CIM-OMF 的影响力从中国时期的“建制型”演变成了亚洲时期的“弥散型”。若与宣道会(C&MA)的运作方式相比较,则更能突显 OMF 的不寻常处。宣信博士(Albert Benjamin Simpson, 1843-1919)生前创办了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Alliance)和福音差传联盟(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这两大机构在 1897 年合并而成宣道会。宣道会虽然也推崇本土化原则,最初也并非以宗派的面目问世,但其无时不与传统西方基督教王国、还是在亚非拉等新兴基督教地区建立的教会和附属机构,皆隶属宣道会体系,甚至冠以宣道会的名称,并于 20 世纪中叶正式成立全球性的宗派联会。因此,该会一直能记录精确的聚会数字和信徒人数,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因而也较易量化。然而笔者认为其吊诡之处在于,一旦宣道会成为一个宗派,其影响力的流通渠道便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传统宗派,并失去跨宗派机构的灵活性与流动性。

另一种视觉化方式乃以传教士为主线,追踪其在不同阶段所拓展的人脉关系,姑且名之为“鱼骨式影响力”。OMF 通常会要求每名传教士在赴任之前建立一个支持团队,这一团队可以包括家族亲友、母会以及在经济上领养传教士的地方教会、祷告小组^③、神学培训机构以及传教士所能触及的其他人脉关系。抵达传教区之后,每名传教士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接触到教会领袖、教牧同工、普通信徒和其他当地人士,同时以代祷信(prayer letter)的方式与母国母会的支持者保持联络。四年一度的述职期间,除非健康不允许,每名传教士皆负有代表差会巡回演讲(deputation)之责,一方面加强原有的支持网,另一方面开辟新的支持源。OMF 现以“母国作业”(home assignment)取代了传统的“休假”(furlough)一词,其用意更为明确。作为跨宗派差会的成员, CIM-OMF

③ OMF 要求每名短宣队员在出发前找到 5 名代祷支持者(*Serve Asia Handbook* [Draft], pp. 17, 22)。OMF 对长宣队员代祷团队的要求不详,但另一信心差会 SIM, 在 1960 年代推出“40 人团契”(forty fellowship)的财政方案,要求每一名传教士候选人找到 40 名愿意承诺财政和代祷责任的支持者。Richard L. Roberts, *The Growth of Interdenominational Mission Societies in New Zealand*, Unpublished Research Essay (MA, History) (University of Auckland, 1977), p. 64.

传教士所收到的演讲、布道、培灵、动员方面的邀请,在频率和范畴两方面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神职人员。历届的凯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曾是英国 CIM-OMF 传教士发挥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平台,尔班拿大会(Urbana Convention)对于美国 CIM-OMF 传教士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几个任期之后,积累了一定资历的传教士(尤其是男性),往往会升任领袖、代理主任级职务、调换驻地、传教区甚至东道国,并在新的环境中组建新的人脉网络或影响力疏通渠道。退任的传教士回国后,除了少数加入 OMF 本部编制(绝大多数 OMF 本部主任和全球离散同工都具海外传教经验),其中相当一部分“复员”到其他宗教性职务,包括教牧人员、神学院教职、国内布道员,在多元的岗位上继续发挥其影响力,表现亦颇不俗。作为“平信徒差会”的成员,并非所有 CIM-OMF 成员皆具备神职人员的资历,但有些教会领袖倾向于聘用从前线“退役”的传教士。譬如,前 CIM 传教士莫如德(Howard Mowll)成为悉尼大主教,是因为他的提名者贝格比(H. S. Begbie)相信一名“具有传教经验和热忱的保守福音派会督”,远胜于一名普通的“保守福音派会督”。^④

具备资历的传教士在神学院出任宣教学讲师的几率通常高于其他科目,其在 OMF 体系下的一手传教经验势必在言传身教中会影响新一代的准传教士。而由传教士转业的教学人员在牧会过程中,通常比一般的神职人员更重视差传动员,更鼓励支持会众中潜在的传教士候选人,也对传教组织(尤其是 OMF 这样的跨宗派差会)配合更为积极默契。虽然退任传教士作为 OMF 影响力的载体比较间接,但由于 CIM-OMF 在百多年的历史中建立了庞大的传教士基数,其所累计形成的集体影响力实在不可小觑:“出中国”之际, CIM 累计招募了 2680 名传教士;截至 2012 年 2 月 11 日, OMF 的累计人数已经增加到 6474 人,这一数据尚不

④ Stuart Piggin, "Introduction: The Reflex Impact of Missions on Australian Christianity," in Hutchinson, Mark and Geoff Treloar, eds., *This Gospel Shall Be Preached: Essays on the Australian Contribution to World Mission* (Sydney, Austral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 Christianity, 1998), p. 17.

包括1950年之前伙伴差会体系中累计加入的979人。^④

除了出任基层教牧职务, CIM-OMF 的团队中还诞生了不少国际差传精英。蒂德曼(R. G. Tiedemann)的书中共录有1950年之前255个赴华基督教新教传教组织,其中约有30家(12%)与CIM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或为CIM的伙伴差会,或由CIM的前成员创建、扩展或促成,较著名者包括“郑安娜差会”(Anna Cheng's Mission)、湖南圣经学校(Hunan Bible Institute)、中国布道十字军(the Christian Native Evangelistic Crusade)、烟台工艺会(Chefoo Industrial Mission)、拿撒勒孤儿技校(Nazarene Industrial Orphanage)、万国邮电基督会(International Postal Telegraph Christian Association)上海及汉口分部、国际联合差会(International Union Mission)、英五旬会(Pentecostal Missionary Union)、神召会(Tsechow Mission)、寿阳差会(Shouyang Mission)等。^⑤

CIM-OMF 的影响力绝不仅止于中国一地, CIM-OMF 体系中“老中国通”的“后中国履历”以及“后 CIM-OMF 履历”也不可忽视。成为其他国际组织的创始人或者总主任的前 CIM 传教士俯拾皆是:剑桥七杰之一施达德(C. T. Studd)之创立“全球福音十字军”(Worldwide



图4 以传教士为主线的“鱼骨型”影响力分析图

F1(Field 1):指禾场1

F2(Field 2):指禾场2

^④ OMF 人事总监与笔者2012年2月11日的通邮。另,截至1989年底,台湾籍赴日传教士林雪玲(丈夫为宋义哲)为 CIM-OMF 成立以来第4634名成员。参见 Australian OMF, *East Asia's Millions*, Century Edition (Apr/Jun 1990), p. 49;《内地会140周年感恩特刊·内地会来台大事记》,中华内地会台湾办事处,2005年,第5页。

^⑤ R. G. Tiedeman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Inc., 2009).

Evangelization Crusade) 和“未及之地使团”(Unevangelized Fields Mission)^⑥、永桂英(Florence S. H. Young)之创立南海福音使团(South Sea Evangelical Mission, 现为 Asia Pacific Christian Mission)和昆士兰卡纳卡使团(the Queensland Kanak Mission)、赫利时(Dick Hillis)之创立东方十字军(OC International)、杨崇恩(A. Wetherell Johnson)之创立国际研经团契(BSF International)^⑦皆为著名的案例。这些机构的领袖作风、组织结构、差传理念和神学倾向皆与 CIM-OMF 十分接近。

亚洲时期的 CIM-OMF 仍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一种“国际 NGO 领袖培养基地”的角色,在新兴亚洲差传国尤其如此。韩国 OMF 成立不过30年,但其成员中已不少人跃升为该国的差传领袖。韩国世界传教协议会(The Korea World Mission Association, 缩写 KWMA)现任事务总长韩定国前身即为 OMF 赴印尼和新加坡两地的传教士,并曾出任 OMF 韩国的本部主任(1993-1996?),今 KWMA 系统中已有21000名传教士。^⑧阿尔泰传教会(Altai Mission)^⑨的主任柳基男,亦为前 OMF 赴日传教士(1988-?),曾出任 OMF 韩国的行政总务(1983-1987)和本部主任(1997-?)等要职。^⑩国际差传先锋会(Global Mission Pioneers, 缩写 GMP)最早的代表之一、服务年限超过17年之久、现任国际总部的国际主任和危机管理顾问的都文钾,亦曾在韩国 OMF 担任过行政总务一职近10年。^⑪曾为 CIM-OMF “老中国通”海春深(George Harris)立传的马克·布拉德肖(Malcolm R. Bradshaw)后转入宣明会(World Vision)以及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在穆斯林事工中颇有成效。个人、家族或 CIM-OMF 团队获得的“中国经验”和“汉语能力”更是为 CIM-OMF 体系的成员提供了一种可

^⑥ 参见 Norman Grubb, C. T. Studd: *Cricketer and Pioneer*, 陈锡麟译,《施达德传——运动家和开荒者》,香港:证道出版社,1964年。

^⑦ 参见 Audrey N. M. Wetherell Johnson, *Created for Commitment — the Remarkable Story of the Founder of the Bible Study Fellowship* (Illinois: Tyndale, 1982).

^⑧ 《韩国 OMF 成立三十周年》(韩文),第1页。

^⑨ 该会成立于2000年,致力于动员及差派韩籍传教士前往阿尔泰语地区传教。阿尔泰地区的语言文化与韩国非常接近。

^⑩ 《韩国 OMF 成立三十周年》,第4页。

^⑪ http://www.gmp.or.kr/, 2011年4月19日;《韩国 OMF 成立三十周年》,第3页。

以转换成亲和力和领导力的稀缺“社会资本”,赋予其出任涉华国际 NGO 领袖所必需的两栖能力。原赴台传教士巴柝声(Ross Paterson)离开 OMF 后创立安提阿事奉团(AM-CCSM),原赴台传教士安德生(Peter Anderson)离职后成为建华基金会(Jian Hua Foundation)^{④⑧}的负责人,原 OMF 总主任戴绍曾(Hudson Taylor III)卸任后创立国际医疗服务机构(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④⑨}皆为比较著名的案例。

“鱼骨式的影响力”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 CIM-OMF 传教士的“代际传承”。早在“中国时期”,CIM 便在中国烟台建立了传教士子弟学校,在当时尚属创举。在英国殖民全盛期的话语体系中被称作“苏伊士河以东最佳英语学校”的芝罘学校(Chefoo School),至 1942 年,该校男女两部共入学 2116 人,含 CIM 子弟 756 人,毕业后献身传教事业者凡 152 人,其中 111 人加入 CIM,41 加入其他差会。在 CIM 内地会子弟中,每百人便有 20 人、每 2 年便有 5 人从事传教工作。^{⑤①}由于信心差会通常起源于一两领袖的宗教热忱,故家族传承的印记十分显著,但在 CIM-OMF 体系中,不仅出现了被台湾学者魏外扬称作“戴家班”^{⑤②}、“海家班”^{⑤③}、“金

④⑧ 参见 Miwa Hirono, *Civilizing missions: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agencies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07-110.

④⑨ 后更名 MSI Professional Services.

⑤① 张陈一萍、戴绍曾等编译:《惟独基督——戴德生生平与事工图片纪念册》,香港:海外基督使团,2005 年,第 68 页。

⑤② 代指戴德生直系后裔中所出现的赴华(包括赴台)传教士,包括戴之长子戴存仁(Herbert Hudson Taylor)、次子戴存义(Frederick Howard Taylor)、女戴存爱(Maria Hudson Taylor);戴存仁之子戴永冕(James Hudson Taylor II)、孙戴绍曾(James Hudson Taylor III)、曾孙戴继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

⑤③ 代指戴德生的妹婿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家族中所出现的 CIM-OMF 传教士,包括其 10 名子女中的海福德(Gertrude Broomhall,后为戴德生继任何斯德之夫人)、海国禄(Hudson Broomhall)、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海懿德(Edith Broomhall)、海文启(Benjamin Broomhall Jr.);海国禄的女儿海宽爱(Mary Gertrude Broomhall)、海宽厚(E. Marjory Broomhall)、海懿德的女儿芮文涛(Anna Ritchie),海文启的次子海恒博(Alfred James Broomhall)。海文启的长子保罗虽非传教士,却长年出任 OMF 的英国咨委会成员。除加入 CIM-OMF 外,海氏家族中还有很多子弟加入其他国际传教组织。

家班”^{⑤④}等以戴氏家族为中心的传教士族谱,普通传教士成员的代际传承也很普遍,如“祝家班”^{⑤⑤}、“孔家班”。^{⑤⑥}除了成为新一代传教士或他教牧人员外,传教士子弟也比同龄人拥有更多成为汉学家、亚洲专家、史学家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资本。譬如,【加】文衡理、【美】文顾德恺夫妇(Harry/Henry & Marguerite Elizabeth Owen, Jr.)之子诺曼·G. 欧文(Norman G. Owen)博士,后来便成为香港大学的亚洲史教授。^{⑤⑦}【加】敖志登、【英】敖义师仁夫妇(John A. & Lilian Austin)的幼子阿尔文·奥斯汀(Alwyn Austin)后来成为安大略布罗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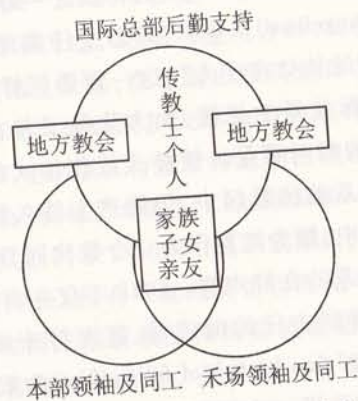


图5 以传教士为核心的“涟漪式”影响力分析图

⑤④ 代指戴德生好友及亲家金尼斯(Henry Crattan Guinness)家族中所出现的 CIM-OMF 传教士,包括嫁给戴德生次子戴存义的金乐婷(Mary Geraldine Guinness)、其弟金纯仁(Gershom Whitfield Guinness)、金纯仁之子金立时(Henry Guinness)。

⑤⑤ 代指 CIM 早期传教士祝名扬(Charles H. Judd)家族中的 CIM-OMF 传教士,包括其两个儿子祝康宁(Frederick Judd)、祝家宁(Charles Judd Jr.),以及祝家宁的两个女儿祝美兰(Kathryn Judd)、祝美柏(Maybeth Judd)。

⑤⑥ 代指 CIM 传教士孔好义(H. S. Conway)家族中的 CIM-OMF 传教士,包括其女儿孔丽华(Norah Conway)和儿子孔卫道(Gordon Conway),孙子 Linton Conway,孔卫道的女儿 Maybeth Conway 和外孙女 Sandra Roberts。

⑤⑦ Dr. Norman G. Owen, “‘This One Thing I Do’: A Single-Minded American in China”, conference paper on women and diplomacy, 2004.

系副教授,并著有多部与CIM相关的学术著作,其中以《亿万华民:中国内地会与晚清 1832-1905》(*China's Millions: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and Late Qing Society, 1832-1905*)争议最大。

第三种视觉化方式则视传教士为核心(图5),并依此划分出若干同心圆,姑且名之为“涟漪式影响力”。CIM-OMF传教士将母国和禾场两大人脉关系融会贯通的案例俯拾皆是:英籍赴华成员艾得理的国际学生事工、德籍赴台成员葛忠良的德华事工、瑞(士)籍赴日成员鲍勃·坎宁安(Bob Cunningham)的“撒玛利亚人团队”皆颇经典。笔者认为,无论在中国时期,还是亚洲时期,CIM-OMF的特长之一即“人际关系式的传教法”(interpersonal evangelism)。OMF前总主任戴绍曾在论及另一国际NGO时曾强调“我们的长处在于人”,这一评语同样适用于CIM-OMF。其对人的重视、对人际关系的把握,大大弥补了其在机构建设、财力筹集、学术研究等方面的相对不足。使徒式或作坊式的深度培训方式,是其在不能建立自身体系的传教区中,仍能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深层原因。笔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颇为诧异作为一个数代同堂的百年老店,CIM-OMF在各所在地所维系的良好声誉。OMF不仅在当地合作者以及现有团队中达成默契,与辞职去任的旧成员、甚至抨击批评者也能不计前嫌,^⑤以“维系团契情谊”(no breach of fellowship)为底线,视之为将来的潜在合作对象,着实展示了一个国际跨宗派大型传教组织的气度与远见。当然,人际式和关系式的影响力传播方式,也增加了学者的研究难度。

四、CIM-OMF 文宣出版之影响力

CIM-OMF最成功、最突出的影响力渠道,恐怕是其文宣出版活动。据培根统计,自1865-1952年间,CIM共出版了近300本英文著作,1952年之后至其论文完成期间(80年代初),又累计出版了259本书籍。^⑥作为一个公开宣传以“不募捐、不借贷”为财政原则的“信心差会”,且无宗派或大型教会为其提供固定的经费来源,内地会自草创之初,便非常重视“文字公关”。若说CIM-OMF不仅是一个大型国际传教组织,还是一个多产的出版机构,并不为过。在质与量两方面,在整个国际差传界中,几乎无出其右者。戴德生深悉,在印刷出版仍是日出产业的时代,文宣是向现有与潜在支持者沟通以及扩大影响力的最有效渠道。除了单行本书籍外,CIM-OMF还出版发行若干种定期出版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创刊于1875年的会刊《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不间断地发行了77年(若加上其前身、创刊于1866年的《不定期报》/*Occasional Paper*,则长达86年)。《亿万华民》很有可能是英语世界最早定期专门报道中国事务的大众刊物,^⑦在西方基督教王国构建或重塑“中国形象”的同时,也扩大了CIM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几乎每一个本部的成立,皆伴随着当地版《亿万华民》的流传,故先后有英伦版、北美版、澳新版,甚至针对部分北欧读者的德语版。会刊的发行量往往反映了CIM-OMF在该地区支持圈的人数。在CIM发祥地发行的英伦版《亿万华民》,在1950年

^⑤ Daniel W. Bacon, *From Faith to Faith*, p. 139.

^⑥ 在此之前,戴德生最初加入的差会——中国布道会(Chinese Evangelical Society)于1849年成立后,也曾出版过一份期刊,但其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屡易其名(*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 [1850-1851], *The Gleaner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 [1851-1853], *The Chinese Missionary Gleaner* [1853-1859]),发行量也较小,很难称得上“大众期刊”。其他的差会赴华传教士的报道,则通常夹杂穿插在该机构其他禾场的报道之中,极少以中国为单一焦点。而创刊于1832年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旧译《澳门月报》)、1850年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和1869年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的发行范围,则局限于在华的西侨团体。早期赴华传教士的著述多为单行本,且读者群局限于教会和差会的领袖层,很少惠及到普通信众。

^⑦ 邀请陈崇桂共创重庆神学院即为一经典案例。加拿大学者 Alwyn Austin 在他的 *China's Millions* 一书中,对 CIM 及其创始人提出极具争议性的论述,OMF 仍得以邀请因意见不同而辞职的赴台传教士成员戴德理(G. Wright Doyle)为其撰写书评辩护,戴氏的书评为笔者所见该书所有书评中措辞最犀利的一篇,该书评于2007年同时在戴氏主笔的“世华中国研究中心”(Global Chinese Center)的网站(<http://www.globalchinacenter.org/analysis/christianity-in-china/chinas-millions.php>, 2012年1月7日)和OMF的差传学通讯 *Mission Round Table* (Dec. 2007, vol. 3, no. 2)上发表。即便是 Austin 本人,虽在此之前已经发表若干对 CIM 评价较为负面的论文,但其在写作过程中仍得到了 OMF 各分支和各成员的协助(详参该书鸣谢部分)。

发行量已达16000份。^⑤ 德语版《亿万华民》虽然发行时期较短,但在20世纪初创刊时,刊印量便达到4000份。^⑥ 瑞士本部草创之初(1946年),《新闻通讯》(*News Bulletin*, 瑞士语 *China Nachrichten*)的发行量仅100份,至1949年已增加到980份。瑞士本部正式成立翌年,出版德语版的《亿万之众》(*Millionen*),订阅量为1200份,1957年增至2000份。^⑦ 出中国、入亚洲的转型期间,《亿万华民》曾数度更名,折射出CIM-OMF在身份定位方面矛盾、踟蹰的心态。1952年首度更名为《亿万之民》(*The Millions*),揭示当时内地会虽已感知无法继续在华传教,却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事奉方向;1958年再度更名为《亿万东亚之民》(*East Asia's Millions*),表示已确定亚洲为新工场;至2000年,因不断有新工场和新族群(*people group*)进入视野,英国版更名为《亿兆东亚之民》(*East Asia's Billions*),其他版本则保持原名。或因缺乏“中国时期”独家报道聚焦力度,这份会刊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除了每月或双月发行的会刊外,内地会还发行三种年刊:一种是《年报》(*Annual report*),向其支持者公布年终总结、传教进展和财务状况;一种是《当年故事》(*Story of the Year*),通常是一些轶事性和个人化的故事;第三种是每年印发给差派各国祷告小组及支持者的《祷告名录》(*Prayer Directory*),兼具工具手册和通讯录的功能,按每周7天的顺序罗列各地传教士和欧美澳纽各本部成员的姓名和驻地。

无论期刊发行得再广,也终会成为明日黄花;而单行本书籍则可视市场需求不断翻印。CIM-OMF的出版物中影响最深远者莫过于其创始人戴德生的传记。培根甚至认为,戴氏传记对基督教差传事业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戴氏本人直接的影响。^⑧ 戴德生的传记在欧美培训传教士的圣经学院是作为经典藏书。培根在1980年代初曾向美国52家神学机构寄发问卷调查,回收的34份(65%)中

⑤ David Huntley, *The Withdrawal of the CIM from China*, p. 85, 注4.

⑥ Marshall Broomhall, "The German Branch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hina's Millions* (Jun. 1903), pp. 71-72.

⑦ E. Baumann, "C. I. M. - O. M. F. in Switzerland", p. 58.

⑧ Daniel W. Bacon, *From Faith to Faith*, p. 130.

有30位差传学教授(88%)声称戴德生的传记被列为该学院差传学的参考文献,甚至是必读书目。^⑨ 戴德生传记的非英文版本,最初以中文居多,海内外各大中文神学院皆藏有不同版本的戴德生传;自各亚洲本部建立之后,其传记又被陆续译成其他亚洲文字,尤其是韩文和日文。

每一名传教士的写作量皆不可小觑,包括以祷告信的形式与母国母会保持联系,以日记形式记录工作细节,以报告形式汇总工作进展等,因此可以说,每一名CIM-OMF成员皆为潜在的作家。除了以上所提到的几名传教士作家外,CIM-OMF前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还出现过不下10名多产作家,女性作家的作品以传记为主,男性作家则以机构史、灵修学和差传学为主。CIM及其众多成员的生平,经过传教士作家同工的整理润色,成为欧美大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CIM历届总主任中,亦不乏著作等身者,其中尤以孙德生(J. Oswald Sanders)和高力富(Michael Griffiths)著述最丰、影响最大。除了CIM-OMF体系下的出版分支,CIM-OMF传教士的传记也会散见其他出版机构的书目,使得CIM-OMF影响力的涟漪波及更多、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不过,总体而言,亚洲时期CIM-OMF出版物的影响,至今未能匹配其“中国时期”的全盛期,尤其是通俗传记类作品,似乎难以把握住日渐世俗化的西方读者的动脉。虽仍时有佳作问世,但其团队中却至今未能涌现出如金、海、董、杨等“志业型传教士作家”。

五、“CIM-OMF定律”:由影响力引起的影响力衰退

上文述及,CIM-OMF对本土化政策的成功贯彻大大削弱了其知名度。笔者需提出的另一个吊诡的现象便是:CIM-OMF在世界差传界影响力之今不如昔,正是其影响力深远的后果之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CIM-OMF由最初一个边缘化的激进组织,在逐步获得传统差传界接

⑨ Ibid., pp. 137-138.

受和敬重的同时,也开始成为后进信心差会群起效仿的模式。进入20世纪,开山鼻祖早已被埋没在无数后起之秀中。如果不理解这两重情诡现象,便无法测透 CIM-OMF 在体系内和体系外“云遮雾绕式”的影响力”。

CIM 的创始人戴德生被不同的差传学者誉为“新教差传的罗耀拉”^⑤、“信心差会之父”^⑥以及“差传新时代的奠基人”。^⑦虽然 CIM 并非第一个跨宗派的信心差会,^⑧但 CIM 确实是最早期将“信心差会”的原则付诸实践最彻底、传教士成员最多、活动区域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深远的一个国际传教组织。克劳斯·菲德勒(Klaus Fiedler)在其有关信心差会的专论中,将“信心差会”的概念定义为“一个可以将其起源、或更通常的是其运作原则的起源,直接或间接地追溯到 CIM 的差会”。^⑨他认为,所有在非洲服务的信心差会的创建皆可追溯到 CIM 的源头,因此,他将书的副标题定为“从戴德生到今日非洲”。将“信心差会”的理念与运作从中国移植到非洲的关键人物为金尼斯夫妇(Grattan & Fanny Guinness)。金氏与戴氏渊源极深^⑩,他于 1873 年成立的东伦敦培训所为全球第一家专门培养传教士的跨宗派差传学校,截至 1887 年,500 名

⑤ 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为天主教修会耶稣会的创始人。语出 Alfred De Witt Mason, *Outlook of Missionary History* (New York: George H. Dolan Co., 1912), p. 96.

⑥ J. Herbert Kane,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Mission: A Panoramic View of Missions from Pentecost to the Present*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78), p. 96.

⑦ Ralph D. Winter & Steven C. Hawthorne, eds.,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A Reader*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p. 172.

⑧ 培根认为,第一个信心差会为 1852 年成立的“赛拿拿及医疗差传团”(Zenana and Medical Missionary Fellowship, 今为 Interserve),其后为 1860 年成立的“大英叙利亚差会”(British Syrian Mission)和美国的“妇女联合差传会”(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但笔者认为,这 3 个差会只能在“跨宗派主义”方面被称为“信心差会”,其财政策略仍与 CIM 不同,参见 Daniel W. Bacon, *From Faith to Faith*, pp. 88-89. 1829 年前往巴格达传教的 Anthony Norris Groves (1795-1853),也被学者公认为“信心差会之父”,参见 Robert Bernard Dann, *Father of Faith Missions: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Norris Groves* (Authentic Media, 2004).

⑨ 参见 Klaus Fiedler, *The Story of Faith Missions: From Hudson Taylor to Present Day Africa* (Oxford: Regnum Books International, 1994), pp. 11, 32.

⑩ 金尼斯曾申请加入 CIM,但因其年过 30 岁,戴德生劝其留在英国从事传教士培训。

肄业者中有 70 人(14%)加入了 CIM。根据菲德勒的梳理,金尼斯家族至少促成了 14 个信心差会和三大传教士培训所的创建,自此信心差会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⑪ 1875 年 CIM 伦敦咨委会成立之际,金氏便成为其咨询人之一。金氏的一子(金纯仁/G. Whitfield Guinness)一女(金乐婷/Geraldine Guinness)皆加入了 CIM,女儿更成为戴德生的儿媳。

直到 19 世纪末,在中国以外运作的信心差会,无论其规模和影响都很弱小,无法与 CIM 相提并论。在世纪之交,以非洲为传教区的“第二代信心差会”中,苏丹内地会(Soudan Interior Mission, 缩写 SIM)和非洲代信心差会(Heart of Africa Mission, 缩写 HAM)的创始人皆受 CIM 影响极大,并且和 CIM-OMF 一样演变成多元传教区的大型国际型传教组织。北美的 SIM 和 CIM 的领袖互为对方的咨委会成员,协力促成北美信心差会联合会 IFMA 于 1917 年的成立,并一直是该组织两大奠基性成员组织。^⑫ 至 80 年代, SIM 与若干亚非拉地区的其他信心差会合并后,^⑬ 以“差传服务”(Serving in Mission)之名保留了由“S. I. M”这一英文缩写组

⑪ 这些“金尼斯差会”包括: Livingston Inland Mission (扎伊尔, 1878), Congo Balolo Mission, the Svenska Missionsförbundet (此三大组织后来合并为 Regions Beyond Missionary Union), North Africa Mission, Qua Iboe Mission, Algiers Mission Band, Southern Morocco (Medical) Mission, Gospel Missionary Union's Sudan Mission, Sudan Pioneer Mission, Lightbearer's League, Sudan United Mission, Heart of Africa Mission (扎伊尔), Sudan Interior Mission, Africa Inland Mission, 其中一些差会后来形成 Regions Beyond Missionary Union 差传联合会; 包括宣道会(C&MA)和协同会(TEAM)的发展也可以追溯到金尼斯的影响,“金尼斯培训所”包括 New York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1882), Boston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1889), Moody Bible Institute (1889)。参见 Klaus Fiedler, *The Story of Faith Missions*, pp. 36, 39-40.

⑫ Edwin L. Frizen Jr., “An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Interdenominational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 in Relation to Evangelical Unity and Cooperation” (A Major Project,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Deerfield, IL 1981), p. 6, 引自 Daniel W. Bacon, *From Faith to Faith*, p. 99.

⑬ 先后与苏丹内地会合并的差会包括 Africa Evangelical Fellowship (由 South African General Mission 和 South East Africa General Mission 两个差会合并而成),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Fellowship (由 Ceylon and India General Mission 和 Poona and Indian Village Mission 两个差会合并而成), Andes Evangelical Mission (原为 Bolivian Indian Mission), 参见 <http://www.sim.org/index.php/content/sim-history>, 2012 年 1 月 11 日。

成的传统品牌;进入21世纪,SIM和OMF更是在非洲联手协商海外华侨的福音事工。HAM的创建者本身即前内地会传教士、“剑桥七杰”之一的施达德(Charles Thomas Studd),这一组织后来更名为“环球福音十字军”(Worldwide Evangelisation Crusade),今为“国际环球福音会”(WEC International),可谓全球覆盖面最大的植堂型跨宗派差会WEC。

除以上几大信心差会之外,培根书中还提到,塞勒斯·I.斯科菲德(Cyrus I. Scofield)于1890年成立的中美差会(Central American Mission)^⑤、安德鲁·默里(Andrew Murray)和斯潘塞·沃尔顿(Spencer Walton)于1889年成立的南非普传会(South Africa General Mission,即Africa Evangelical Fellowship)^⑥、埃米·卡迈克尔(Amy Carmichael)于1927年正式成立的营救印度神庙童妓的多拉维团契(Dohnavur Fellowship),^⑦亦皆直接受到戴德生的影响,或在组织章程中明确确立以CIM为蓝本。

协同会(Team)则是由原CIM伙伴差会演变而成的大型国际组织。1890年上海召开的在华传教士大会前后,戴德生一直通过不同方式呼吁欧美各宗派在5年内差派千名新人前来中国传教。著名的美籍瑞典裔旅行布道家范岚生(Fredrik Franson, 1852-1908)在德国获阅戴氏题名为“给每一位人”(To Every Creature)的传单,决定代为招募至少百名新人。范氏先在德国成立德华盟会(German-China Alliance),随即返美在芝加哥成立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两者皆为CIM的伙伴差会。在此基础上,范氏又成立了一系列其他差会,这些差会后在1949年之际合并成为协同会(Team),并演变成全球最大的跨宗

④ WEC现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40名成员在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从事传教工作。参见 <http://www.wec-int.org/>, 2011年5月19日。

⑤ 参见其传记:Charles G. Trumbull, *The Life Story of C. I. Scofie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p. 68, 引自 Daniel W. Bacon, *From Faith to Faith*, p. 100。

⑥ 参见 Rowland V. Bingham, "A Story of Beginnings: Dr. Andrew Murray and the South Africa General Mission," *The Missionary Witness* (Sep. 1915), p. 271, 引自 Daniel W. Bacon, *From Faith to Faith*, p. 101。

⑦ Amy Carmichael, Foreword in Joy Guinness, *Mrs. Howard Taylor: Her Web of Time* (London: CIM, 1939), p. 1。

派差会之一。^⑧

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Student Voluntary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 英文缩写 SVM)恐怕是近代国际传教运动中、尤其是北美海外差传影响最大的一次运动。北美 SVM 的兴起和发展在以下几方面直接受到 CIM 的感染和启迪。1885年,剑桥七杰加入 CIM 成为轰动整个英语世界的社会新闻,这一标志性事件具有对内对外双重意义:一方面,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认同使 CIM 从一个“边缘另类差会”转变为受到普遍尊敬的大差会;另一方面,著名学府毕业生联手俯就传教士之志业也成为第二年 SVM 首届黑门大会(Mt. Hermon)的一大导火线。时为 CIM 英国本部总干事、戴德生的妹夫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在1885年7月号的《亿万华民》上报道了剑桥七杰巡回聚会的始末,销量高达5万份。翌年,海氏将该期内容编辑成单行本,并以《福音传遍全地》(*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为标题,由乔治·威廉斯爵士(Sir George Williams)出资寄发给全英所有的青年会分会(YMCA)。^⑨2年后,由海氏书名延伸出来的短语——“在这一世代将福音传遍全地”(the evangelization of the world in this generation)——成为大西洋彼岸 SVM 的口号。^⑩这一期间,剑桥七杰之一施达德(C. T. Studd)之兄 J. E. 基纳斯顿·斯塔德(J. E. Kynaston Studd)应邀效仿“剑桥七杰团”(Cambridge Band)的英伦三岛之行,在美国各大院校巡回领会,直接影响了 YMCA 和 SVM 后来的重要领袖人物穆德(John R. Mott)。CIM 在 SVM 早期几届国际大会上皆有参与,北美本部代表 Rev. & Mrs. Frederick A. Steven 牧师夫妇在1891年首届大会上发言,戴德

⑧ 参见 J. F. Swanson, ed., *Three Score Years . . . and Then Sixty Years' of Worldwide Missionary Advance* (Chicago, n. d., 1950)。

⑨ 该单行本的第一个标题为“A Missionary Band-A Record of Missionary Consecration”,发行量2万册(亦说1.5万册),售罄后再版时定为此名。参见 Leslie Lyle, *A Passion for the Impossible*, p. 55; Marshall Broomhall, *The Jubile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CIM, 1915), p. 166。

⑩ 参见柯喜乐:《圣爱的火焰——中国宣教史上的海家班》,韦华林译,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第101-102页。

生、金乐婷和北美本部负责人亨利·弗罗斯特(Henry Frost)在1894年第二届大会上的讲道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VM发起最初20年间,近半数学生志愿传教士集中在中国和印度两大传教区;1900-1920年间,约四分之三前往海外的北美传教士曾签署过志愿卡(volunteer pledge)。^⑩1900年,SVM邀请戴氏子媳戴存义夫妇巡回布道,在不足8个月的时间内,戴氏夫妇走访了40家医学院、10家神学院、21家大专院校和6家其他学校,完成了SVM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海外差传运动之年,并受邀成为1912年SVM全年的巡回讲员。^⑪

CIM的影响力也辐射到了南半球的英国殖民地和自治领。CIM不仅是最早在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得到承认的跨宗派国际型差会,也是该地区最早出现的有组织的对华传教机构之一。戴德生于1890年首次访问澳洲和于1900年初访问澳新两地的教会,掀起了南半球新大陆对华传教热情;戴氏之子、媳戴存义夫妇(Dr. Howard & Geraldine Taylor)于1927年在澳新两国的巡回演讲,再度引起了当地教会界对中国的关注。加入其他差会的赴华传教士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CIM的影响。对华传教的热潮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之一便是针对中国以外国家与地区的“传教使团”的成立。

以澳大利亚为例,1893年,查尔斯·F.里夫斯(Charles F. Reeve)和E. W. 麦加文(E. W. McGavin)效仿戴德生的模式,成立了“浦那及印度乡村会”(Poona and Indian Village Mission,缩写PIVM),这一差会后来并入SIM国际传教集团。^⑫无独有偶,20年代后期,墨尔本神学院的3名神学生赫德森·索思韦尔(Hudson Southwell)、弗兰克·戴维森(Frank Davidson)和凯里·托利(Carey Tolley)找到CIM本部办公室,希望CIM能把他们3人派往婆罗洲。虽然CIM当时的传教范畴只局限于中国本

土,无意扩展到亚洲,但CIM澳洲本部仍协助这3人成立了“婆罗洲福音会”(Borneo Evangelical Mission,缩写BEM),该会的运作理念、组织结构、甚至行政语词都与CIM-OMF有极高的同质性。1974年,在马来西亚政府的移民限制之下,BEM正式并入OMF;1989年,BEM前成员之一肯·科尔曼(Ken Coleman)成为OMF澳洲本部主任。^⑬CIM不仅激发了后进信心差会的成立,还吸引一些原有差会“改宗”成为信心差会,譬如:新威尔士土著差会(New South Wales Aborigines' Mission)1902年面临财务危机,采用CIM的财政运作方式之后,开始发展壮大。^⑭南海福临财务危机,采用CIM的财政运作方式之后,开始发展壮大。^⑮南海福临福音会(South Sea Evangelical Mission,现为Asia Pacific Christian Mission)和昆士兰卡纳卡使团(the Queensland Kanak Mission)两个差会的创建人则是在新西兰出生长大、在澳洲申请加入CIM的跨塔斯曼海峡的女性传教士永桂英(Florence S. H. Young)。^⑯在新西兰,CIM是最早进入该国教士永桂英(Florence S. H. Young)。^⑰在新西兰,CIM是最早进入该国的跨宗派差会,1891年加入该会的首名新西兰籍成员杭秀珍(Annie Harrison)成为该国首名加入跨宗派差会的传教士。其他较大型的国际差会如WEC和SIM等招募机构则迟至20世纪中叶才在新西兰安家落户。“中国关门”之前,澳大利亚累计向中国差派出500名传教士,其中300名(60%)通过CIM的差传平台,^⑱新西兰在同一时期共向中国差派出245名传教士,其中100名(41%)通过CIM的差传平台。^⑲

一方面,CIM的理念和模式在传统基督教王国差传界被广泛接受,奠定了其“掀开普世差传新一页”的先驱地位,信心差会差派的传教士

^⑩ 参见 Australian OMF, *East Asia's Millions*, Century Edition (Apr/Jun, 1990), p. 40.

^⑪ 该差会1907年更名为 Australia Aboriginal Mission, 1929年再度更名为 United Aborigines' Mission. 参见 Alison Longworth, "'Upon Past Ebenezer We Built Our Jehovah-Jireh': The Vision of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Mission and Its Heritage in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vol. 31, no. 2 (June 2007).

^⑫ 参见 *Pearls from the Pacific* (London, 1925); Janet and Geoff Bengie, *Florence Young: Mission Accomplished* (YWAM Publishing, 2005).

^⑬ Lesley Dixon, "The Australian Missionary Endeavour in China, 1888-1953", Ph. D. Thesis,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78.

^⑭ 袁珊:《“长白云国度”海外传教运动视野下的对华传教新西兰赴华传教士(1877-1952)》,待发表。

^⑮ 志愿卡宣誓的内容为:“若神允许,我愿成为一名海外传教士。”(It is my purpose, if God permit, to become a foreign missionary) 参见 Daniel W. Bacon, *From Faith to Faith*, pp. 109-119; Edwin L. Frizen, Jr., *75 Years of IFMA 1917-1992: The Non-denominational Missions Movement*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pp. 74-75.

^⑯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ederick_Howard_Taylor, 2012年1月25日。

^⑰ <http://www.sim.org/index.php/content/sim-history>, 2012年1月11日。

总体人数超过了传统宗派差会,甚至有取代之势;^⑧另一方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信心差会客观上也开始成为 CIM-OMF 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竞争对手。先以传教区为例,20 世纪下半叶的普世差传运动不仅是美国的天下,也是信心差会的天下,据著名差传学者 R. 皮尔斯·比弗(R. Pierce Beaver)的统计,二战后,香港增加了 9 个北美非宗派或跨宗派差会,台湾增加了 15 个,菲律宾增加了 18 个。^⑨

若从差传中心的角度而言,以差传大国美国的 IFMA 为例,该协会 1917 年成立之初,只有 7 个成员组织,至 1992 年前后,竟拥有 72 家成员组织,在 75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 10 倍左右。^⑩这一数据尚不包括北美其他福音派差会组织(如 EFMA、ACMC、ANAM 等)的成员组织。再以次传教国新西兰为例,据新西兰学者休·莫里森(Hugh Morrison)梳理的数据,1930 年之前,约有 736 名新西兰传教士前往海外传教区,其中 CIM 团队所招募的 58 人约占 7.9%。^⑪这一比例看似平平,但若结合表 2 和表 3 的数据而言,不难发现,与该国宗派型差会比较,CIM 的招募力仅次于长老会(121 人)、弟兄会(120 人)和卫理公会(93 人)等差会,超过了该国本土历史最悠久的差传项目美拉尼西亚使团(40 人)、传教士输出率最高的宗派浸信会名下的传教士(47 人),也超过了其他历史悠久的传统英国宗派差会英行教会(NZCMS)和伦敦会(LMS)。

表 3 显示,CIM 为该国最大的非宗派差会,招募力超过其半数的信心差会 PIVM(46 人),该会虽然在短短 3 年(1896-1899)内奇迹般地差派了 40 名新西兰籍传教士,然而这一“不可持续性”的招募速度很快

^⑧ Johan D. Tahgelder, *Faith Mission* (2001), p. 1.

^⑨ R. Pierce Beaver, *Ecumenical Beginnings in Protestant World Mission; a History of Comity* (New York: Thomas Nelson & Sons, 1962), p. 296.

^⑩ Edwin L. Frizen, Jr., *75 Years of IFMA 1917-1992: The Non-denominational Missions Movement*, p. 446.

^⑪ CIM 新西兰分部差派了 55 人,但澳洲和英国分部另外差派了 3 人,共计 58 人。参见 Hugh D. Morrison, "It is Our Bounden Duty", p. 1.

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⑫就长远而言,CIM-OMF 的步伐更为稳健。其余 4 家招募力超过 10 名以上的跨宗派机构进入新西兰差传界较晚,影响力也较小。

表 2 CIM 新西兰分支与部分宗派型差会(10 名以上)招募力比较表
(按人数多寡排列)

	首名新西兰传教士 差派年份	至 1930 年累计 招募人数
新西兰长老会/PCNZ	1869	121
新西兰弟兄会/Brethren	1894	120
澳大拉西亚卫理公会/AMOM	1827?	93
CIM	1891	55
新西兰浸信会差会/NZBMS	1886	47
美拉尼西亚使团/Melanesian Mission	1867	40
新西兰英行教会分部/NZCMA 及英 国英行教会	1893	39
伦敦会/LMS	1893	12
救世军/Salvation Army	1906	10

资料来源: Hugh D. Morrison, Appendix One, "Missionary Organisations with New Zealand Worker, 1869-1930" and "Alphabetical Listing by Missionary Organisation", "It is Our Bounden Duty":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Zealand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1868-1926, Ph. D. Diss. (History), Massey University, 2004, pp. 280-282, 338-342.

^⑫ 虽然 PIVM 在 3 年内招募到 40 名新西兰成员,但是截至 1930 年,其新西兰籍成员的总人数仅为 46 人。参见 Hugh D. Morrison, "It is Our Bounden Duty":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Zealand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1868-1926, Ph. D. Diss. (History), Massey University, 2004, pp. 52, 342.

表3 CIM 新西兰分支与其他跨宗派差会(10名以上)招募力比较表
(按人数多寡排列)

	首名新西兰传教士 差派年份	至1930年累计 招募人数
CIM	1891	55
浦那及印度乡村会/PIVM	1896	46
玻利维亚印度会/Bolivian Indian Mission	1908	19
南海福音会/SSEM	1911	17
苏丹联合差会/Sudan United Mission	1912	15
苏丹内地会/SIM	1921	13

资料来源:同表2。

二战结束之际,CIM 仍为新西兰信心差会的领军者,但在1956年,该国跨宗派差会的数量增加到28家,CIM-OMF 该年所差派的26名成员占该国620名海外传教士总数的4.2%。^⑨至1972年,各个跨宗派差会成立了新西兰福音派差传联盟(New Zealand Evangelical Missionary Alliance, NZEMA),最初加入的成员组织达到44个;^⑩目前已增至58个,包括若干宗派型差会,如CMS。^⑪1891-1975年间,CIM-OMF 共差派了188名新西兰背景的传教士,在设立本部主任之前(1891-1957)的

年均招募率为1.5人,设立本部主任之后(1958-1975)的年均招募率为4.5人。WEC在1962-1975年间差派了65人,年均招募率为4.6人,与CIM-OMF 不相伯仲;SIM 进入新西兰最初7年的年均招募率为2.4人,1948-1976年间渐增至3人,比WEC和OMF 略逊。1975年NZEMA 各成员组织共差派了663名传教士,OMF 占70人,WEC 占71人,比例上皆为10%,SIM 占42人(6%)。^⑫

旅美学者姚西伊博士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提及,其导师达娜·罗伯特(Dana Robert)认为,在19世纪下半叶,“内地”(inland)成为欧美宣教界的一个关键词或流行语,意在将第一代传教运动在沿海地区和商贸中心所建立的“接触区”(contact zone)向内地和乡村推进。在这一大潮下,“内地”成为了一个运动;而作为第一个将“内地”嵌入机构名的差会,CIM 成为了信心差会之标本或范本。^⑬CIM 成立之后一个半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相继成立了很多带有“内地”字眼的传教组织:如利文斯顿内地会(Livingstone Inland Mission, 1878)、苏丹内地会(Soudan Interior Mission, 1893/1898)、非洲内地会(African Inland Mission, 1895)、澳洲土著内地会(Aborigines Inland Mission, 1905)^⑭、非洲之心差会(Heart of Africa Mission, 1913)、巴西内地会(Brazil Inland Mission, 1955)。^⑮即便宗派背景的传教组织也开始在机构名中采用“内地”一词:如长老宗背景的澳洲内地会(Australian Inland Mission, 1912)^⑯、弟兄会背景的加拿

^⑨ J. H. M. Robinson,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New Zealand," *Overseas Bulletin*, vol. XIX, no. 4 (July 1957), p. 85. 同年,CIM-OMF 加拿大的负责人也在内部通讯中担忧,CIM 北美最初的落脚点多伦多,至少已有17家跨宗派差会的办事处,尚不包括在其他城市设点的差会。参见W. W. Tyler, "China Inland Mission in Canada," *Overseas Bulletin*, vol. XIX, no. 6 (Nov. 1957), p. 142.

^⑩ 此为1974年的数据,参见Richard L. Roberts, *The growth of Interdenominational Mission Societies in New Zealand*, Research Essay (MA, History), University of Auckland, 1977, p. 72.

^⑪ 今为Missions Interlink NZ, 参见<http://missions.org.nz/members-directory.html>, 2012年1月11日。

^⑫ R. L. Roberts, *The Growth of Interdenominational Mission Societies in New Zealand*, pp. 26, 48-49, 62, 72.

^⑬ 笔者于2011年1月4日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对姚博士的访谈。

^⑭ 该组织在保留英文缩写前提下现已更名“澳洲本地事工”(Australian Indigenous Ministries), <http://www.aimpa.com/About.htm>, 2012年1月16日。

^⑮ http://www.brazilinlandmission.org/about_bim.html, 2012年1月16日。

^⑯ 澳洲内地会(AIM)的正式名称为澳洲长老差会(Austral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隶属澳洲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Australia), 故为宗派差会, 但AIM的知名度更高, 后来更名为长老内地会(Presbyterian Inland Mission)时仍保留了“内地”两字, 参见http://www.pim.org.au/about_pim.htm, 2012年1月16日。

大内地会(Canada Inland Mission, 1945)^⑩和门诺派的刚果内地会(Congo Inland Mission, 1911)^⑪除了这些欧美差会之外,一些晚近的本土差会也采用了“内地”之名:如印度内地会(India Inland Mission, 1964)^⑫、喜马拉雅内地会(Himalayan Inland Mission, 1983)^⑬、尼日利亚的恩典之基内地会(Grace Foundation Inland Mission)^⑭。这些传教组织未必与 CIM-OMF 有直接的关系,但至少采用一个以上 CIM-OMF 式的原则和策略。北美 IFMA 所认同的一系列价值观特性,几乎与 CIM-OMF 的差传理念完全重叠:财政方面的信心原则、对“未及之民”的关注、跨宗派主义、传教区主导型的领导、成员制、圣经学院培训制、女性同工的地位、简朴的生活方式、与其他福音派差会的合作甚至合并、创意差传、对祷告的倚重、平信徒参与、社会事工辅助福音布道、保守型的福音主义。^⑮虽然 CIM-OMF 的全球影响力更多是理念性的而非体系性的、弥散型的而非建制型的、人际关系性的而非组织结构性的,但仍可以说, CIM-OMF 的“成功故事”(success story)确实已将传教使命之“内地化”和“进深化”的理想普及化了。

澳籍日裔学者美和森本(Miwa Hirono)甚至认为, CIM 的运作与人事理念影响了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中国的 NGO。建华基金会(英文缩写 JHF)由 4 名香港基督徒商人于 1981 年成立,其一线工作人员则以欧美专业人士为主。这些成员不仅不能从 JHF 支取薪水,还必须自筹旅费和生活费,而且每年要向 JHF 上缴数百美金的行政费用。因此, JHF 采用的不是普通 NGO 商业化和世俗化的“雇员制”,而是类似于 CIM-OMF 原创的“成员制”或“伙伴制”。此外,森本也注意到 JHF 对夫妻子女一

定居服务所在地的要求,也有别于普通 NGO 家属安居沿海都市、专家本人独行侠式旅行作业的模式。笔者认为, JHF 以家庭为整体服务单位的理念,与 CIM-OMF 强调夫妻双方必须具备同样服务热忱的要求颇为接近。^⑯

笔者将 CIM-OMF 总体影响力传播方式称之为“双向发散型”,并用图 6 的形式表现如下:一方面, CIM-OMF 在传统基督教王国各大本部的宣教动员,促进了很多其他新兴传教组织(新差会 A-C)效仿其运作模式而成立,并将之带向传教目的地(新禾场 A-C)。另一方面, CIM-OMF 在自身的传教区中建立教会、提供神学教育、成立新的差传本部、培养当地教牧和信徒的传教意识、协助成立当地的传教组织(新差会 D-F),并将这些传教理念带往新的差传目的地(新禾场 D-F)加以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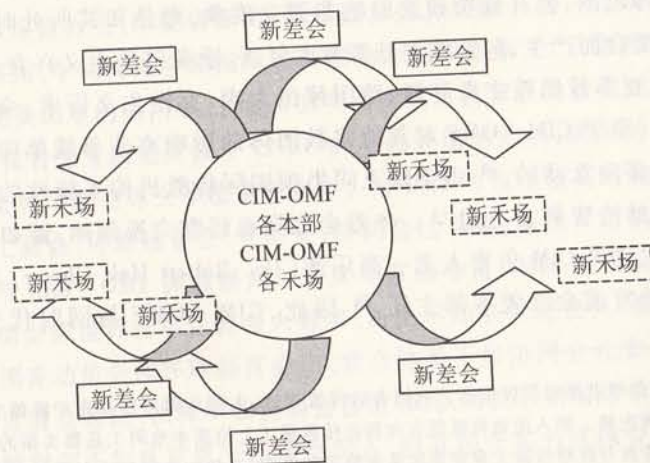


图6 “发散型”影响力分析图

⑩ http://www.gameo.org/encyclopedia/contents/canada_inland_mission_canadian_conference_of_mennonite_brethren_churches, 2012年1月16日。

⑪ <http://www.gameo.org/encyclopedia/contents/C6658.html>, 2012年1月16日。

⑫ <http://www.croftonparish.org.uk/india-inland-mission>, 2012年1月16日。

⑬ <http://www.adnamis.org/partners/represent/38>, 2012年1月16日。

⑭ <http://www.gracefoundations.net/>, 2012年1月16日。

⑮ Edwin L. Frizen, Jr., *75 Years of IFMA 1917-1992: The Non-denominational Missions Movement*, pp. 15-19.

⑯ 参见 Miwa Hirono, *Civilizing Missions: International Religions Agencies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108; <https://www.jhf-china.org/cms/index.php?id=home>, 2012年1月24日。

六、结 语

本文虽然通篇论述的是 CIM-OMF 在全球的影响力,但为了避免读者形成过度夸大的印象,极有必要加几句调适之言。从方法论角度而言,个案研究容易对研究者产生“移情效应”,组织机构的研究亦在所难免。换言之,由于长期浸淫在某一人物和组织的文献资料中,研究者容易在潜移默化中认同研究对象的价值观与元叙事。另一方面,聚焦点过于集中在个案,也会导致研究者忽略与研究对象地位相当的同时代的人与事,包括竞争对手和制衡因素,从而削弱了处境化的客观考量。基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限制,其学术研究通常无法确立因果关系(causation),而笔者所有的论述,至多只是“相关性”(correlation)的一种建构。如上所述,CIM-OMF 的影响力确实在近 150 年的历史中扩散到了全球范围,但其成功和发展绝非孤立现象,而是和其所处时代大背景互动磨合而产生,包括欧美基督教大复兴、欧美殖民主义兴衰、国际冷战格局、亚非拉民族主义苏醒、跨国移民大潮、女性主义诉求、全球城市化等等。至于 CIM-OMF 对其他宗教团体的影响亦非单线单向那般简单,而是多向互动的。^⑩ 由于缺乏同类项国际传教机构系统性的横向比较,任何结论皆属言之过早。各差会之间也经常交换领袖,譬如:1920-1930 年代北美 CIM 负责人之一高乐弼(Dr. Robert Hall Glover, M. D.)原来便是宣道会北美本部主任。^⑪ 因此,CIM-OMF 与同时代全球福

^⑩ 譬如,香港学者蔡锦图曾指出,“内地会的传教模式,大部分都可以在先于戴德生的传教士中找到先例。深入内地传教的方向和在传教事工上倚重本地同工是郭实腊的理想,强调医疗传教与鼓励传教士身穿华服是麦都思的经验,避免向本国领使上诉是宾惠廉的提醒。”参见蔡锦图:《戴德生与中国内地会(1832-1953)》,香港:建道神学院,1998 年,第 202 页。

^⑪ 高氏原为宣道会医疗宣教士,曾于 1899 年在广西梧州创立“建道书院”,结束在华 17 年传教生涯后,返美为本部主任,1921-1926 年受聘为慕迪神学院海外宣教科主任,1926 年成为北美内地会本部副主任,12 年后升任总主任。曾著 *The Progress of World-wide Missions* (1924), *The Bible Basis of Missions* (1946),被各神学院选为差传学课本,参见罗腓力编著:《宣道与中华》,香港:宣道出版社,1997 年。

音派大团体的互动亦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个人层面。CIM-OMF 的团队和理念固然影响了每一个成员,但亦不乏个别成员对 CIM-OMF 产生影响的案例。19 世纪末,剑桥七杰的加入曾大幅提高了 CIM 的国际知名度,20 世纪上半叶 CIM 的美国化促使 CIM 在自由派与基要派之争中破坏了与宗派教会的旧谊,20 世纪下半叶没有经过内部晋升而成为 CIM-OMF 总主任的外聘领袖韩大为(Dr Christopher David Harley)^⑫也为这 100 年差会带来新的革新动力。

基于以上的制衡评述,笔者最后将 OMF 与全球其他国际传教组织做一简要比较,作为本文的结尾。约翰斯顿书中所列团队人数在 1000 人以上的基督教新教传教机构约有 21 家之多。表 4 中的数据 displays:宗派差会已经大幅退出普世差传的愿景,美南浸信会、神召会、弟兄会的差传部为硕果仅存的大型宗派性传教组织,世界青年宣教会和世界福音动员会以短宣为主,印度福音团、西非福音会为局限于单一区域禾场的本土布道团,学园传道会和国际校园团契专精学生事工,儿童福音使团为针对北美国家的国内事工,世界宣明会为具宗教背景的救援性和发展性 NGO,福音为亚洲是类似于 CNEC 的雇佣兵型的差会,其余的威克里夫译经会和导航会等为非植堂性差会。与 OMF 可比性较高的差会只有国际事工差会、环球福音会、宣道会、协同会这 4 家,而这 4 家机构无一例外皆与 CIM-OMF 渊源极深。若从单方面考量,OMF 在成员上不及学园传道会或世界青年宣教会人数多、历史不如宗派差会久、覆盖面不如世界福音动员会或环球福音会广、堂会体系不如协同会扎实、神学教育不如宣道会系统、预算不如宣明会富足、团队增长不如国际学生团契、语言专精程度不如威克里夫译经会深入,但其综合实力或综合影响力,则可以说超过了表 4 中所有的国际传教机构。

^⑫ Harley 夫妇最初在伦敦牧会,后赴埃塞俄比亚传教 5 年,1978 年加入 All Nations Christian College 任教,妻子授课 15 年,丈夫担任院长 8 年,后来成为 Crosslinks Missionary Society 和 World Evangelical Fellowship Missions Commission 的国际培训顾问,1996 年移居新加坡出任 DTC 的教务长,并在三一神学院担任差传学讲师。

表4 千人以上的国际传教组织 1993-2001 年团队人数之增减

机构名称	成立年份	团队人数		增减率
		1993 年	2001 年	
学园传道会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1951	11043	15218	37.8%
福音为亚洲(Gospel For Asia)	1974 以后	—	12565	—
世界青年宣教会(YWAM)	1960	7078	11808	66.8%
威克里夫译经会 (Wycliffe Bible Translators)	1942	6267	7031	12.2%
美南浸信会国际差传部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	4735	5034	6.3%
导航会(Navigators)	1933	3376	4089	21.1%
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	?	3256	3546	8.9%
新部落差会(New Tribes Mission)	1930	3356	3073	-8.4%
世界福音动员会 (Operation Mobilization)	1957	2234	2977	33.3%
印度福音团 (India Evangelical Team)	1970s	575	1996	247.1%
环球福音会(WEC International)	1912	1511	1925	27.4%
国际事工差会(SIM International)	1898	1490	1693	13.6%
宣道会(C&MA)	1887	1119	1652	47.6%
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1977	1287	1559	21.1%
弟兄会 (Christian Brethren Assemblies)		1363	1429	4.8%
西非福音传教会(Evangel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West Africa)	?	832	1423	71%

续表

机构名称	成立年份	团队人数		增减率
		1993 年	2001 年	
国际学生团契(IFES)	1947	102	1374	1247.1%
海外基督使团(OMF)	1865	1077	1245	15.6%
儿童福音使团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1937	2621	1192	-54.5%
浸信会中差会 (Baptist Mid-Missions)		—	1065	—
协同会(Team)	1890	1034	862	-16.6%

资料来源: Patrick Johnston, 5th ed., *Operation World: Day-to-Day Guide to Praying for the World* (Appendix 2: Agencies, Cumbria: OM, 1993), pp. 631-640; Patrick Johnstone, Jason Mandryk, & Robyn Johnstone, 6th ed., *Operation World* (Appendix 3: Mission Agencies, WEC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ffice, 2001), pp. 743-746.